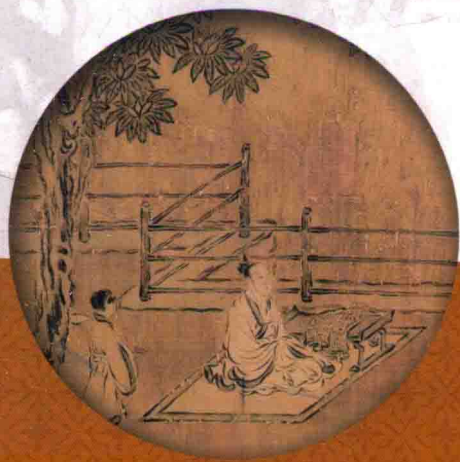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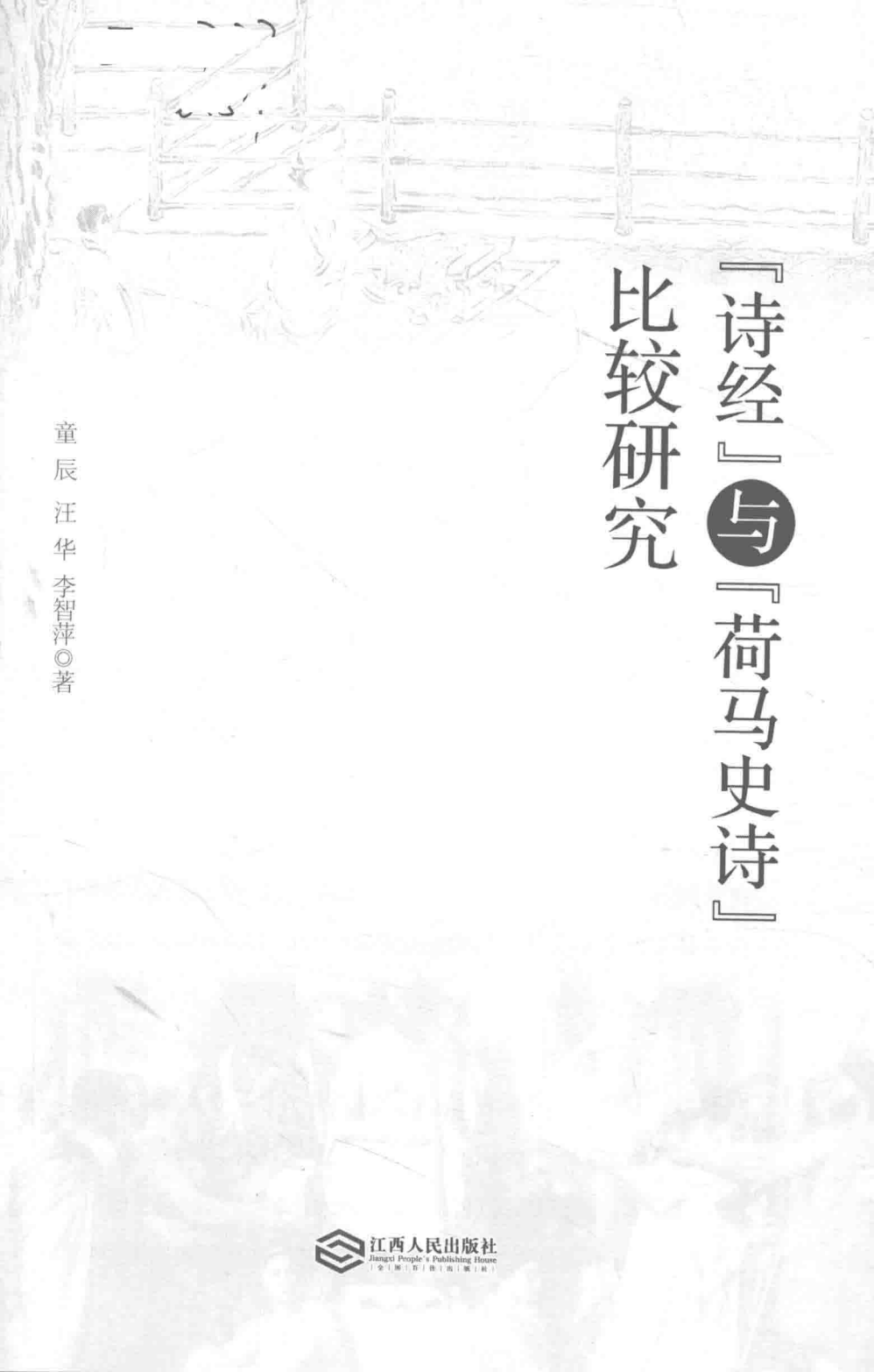
『诗经』与『荷马史诗』 比较研究

童辰 汪华 李智萍◎著

华东交通大学教材（专著）基金资助项目



SHIJING YU HEMASHISHI
BIJIAOYANJIU



『诗经』与『荷马史诗』 比较研究

童辰 汪华 李智萍◎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金·图·书·馆·藏·书·目·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 / 童辰, 汪华, 李智萍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10-06483-1

I. ①诗… II. ①童… ②汪… ③李… III. ①《诗经》
—诗歌研究 ②《荷马史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②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274 号

《诗经》与《荷马史诗》比较研究

作者: 童辰 汪华 李智萍

出版: 江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伟平

装帧设计: 游珑

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邮编: 330006)

发行部电话: 0791-86898815

编辑部电话: 0791-86898054

E-mail: taxue888@foxmail.com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288 千字

ISBN 978-7-210-06483-1

赣版权登字-01-2014-25

定价: 36.00 元

承印: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大凡文学作品,都具有其特定的民族色彩,各民族的文学,在反映各自的社会生活及人物事件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民族意识,正因为此,文学才被称作是具有民族性的。但是,如果将文学看作是“世界性的,又是人民的文学”(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75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并沿着文学史发展的轨迹,向上追溯到人类社会的童年阶段,不难发现,东西方的文学都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对同被称作“光辉的起点”的两部东西方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代表作——《诗经》与《荷马史诗》进行一些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两三千年前我国诗歌辉煌成就的重要标志,共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大约500年间的305篇诗歌作品,其中的诗歌主要流传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少数也流传于长江及汉水流域;



部分诗歌是由贵族诗人创作的,但大多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

《荷马史诗》(分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个部分),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重要作品。它以绚丽多彩的生活画面,气势磅礴的高昂格调,质朴纯真的艺术风格,对后世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对两部经典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可以反映出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在上古时期具有某些相似之处,《诗经》与《荷马史诗》是东西方最早的文学名著,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光辉起点,对东西方后世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它们在东西方各自的文学发展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两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各自具有其典型的特征,但在人类发展史的前期,文化发展同时处在萌芽状态,而文化则是随着相同的原因,即人类的生产劳动而产生出来并发展起来的。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的同时,能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创造,并在初期的文化上反映出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在初期文学艺术的创作上,各民族具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和手段,来揭示各自对世界的观察和反映,也就自然而然了。

目前,高等院校文史类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等的教学,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单一性,各讲各话,各有侧重,缺乏对东西方两个文学发展脉络的对比研究。尤其是在外国语学院的美文学教学中,仅仅针对英美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教学分析,

对形成和影响英美文学的古代西方文学的发展部分的教学则严重缺失,更遑论对其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展现和研究,以及对学生的母语文学素养的培养了。“腹有诗书气自华”,针对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训练,离不开文学的熏陶,包括同样有着源远流长传统和灿烂光辉历程的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熏陶。因此,对《诗经》与《荷马史诗》这两部东西方伟大作品进行一些全方位的比较,对于高校人文教学而言,无论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是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因此,作者拟通过对《诗经》、《荷马史诗》以及后世对两部作品的研究著作的搜集、整理与考证,比较出两部作品在成书过程、作品内容、艺术特色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诸方面的异同,探索两个民族在其经典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民族心理,以及形成这种社会面貌和民族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

作者

2012年6月18日于华东交通大学

目 录

第一部分:光辉的起点:两部巨著的成书经过比较

- 一、《诗经》的成书经过 3
- 二、《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 11
- 三、《诗经》与《荷马史诗》的成书经过比较 17

第二部分: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两部巨著的内容比较

- 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经》的主要内容 23
- 五、“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百科全书”:《荷马史诗》的主要内容 37
- 六、《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内容比较 46

第三部分:优美动人的交响乐:两部巨著的结构比较

- 七、《诗经》的结构特色 59
- 八、《荷马史诗》的结构特色 70
- 九、《诗经》与《荷马史诗》的结构特色比较 85

第四部分:朴素典雅的美丽牧歌:两部巨著的创作手法比较

- 十、美丽纯真:《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93
- 十一、奇幻异想:《荷马史诗》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101
- 十二、《诗经》与《荷马史诗》的创作手法比较 107

第五部分:错落有致的多声部合唱:两部巨著的语言特色比较

- 十三、口语化的语言风格 117
- 十四、比喻手法的普遍运用 125
- 十五、节奏与韵律 135
- 十六、《诗经》与《荷马史诗》在艺术上的一些差别 144

第六部分:永恒的魅力:两部巨著的历史地位比较

- 十七、两部巨著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比较 161
- 十八、两部巨著对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 180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3

第一部分

光辉的起点：
两部巨著的成书经过比较

一、《诗经》的成书经过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两三千年前我国诗歌辉煌成就的重要标志，共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 11 世纪至公元前 6 世纪）大约 500 年间的 305 篇诗歌作品，其中的诗歌主要流传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少数也流传于长江及汉水流域；部分诗歌是由贵族诗人创作的，但大多是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

《诗经》的编撰成书，大约完成于公元前 6 世纪，并作为当时政府的礼乐、教育资料保存下来。但是，《诗经》中的作品，从年代、地域、作者诸方面看，将它们汇集成书都不是朝夕间的事。有关《诗经》的成书，历史上有三种看法：

（一）采诗说

先秦古籍并无明确的采诗观点，但有两条相关的记载。

其一，是《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古之道人以木铎记诗言。”朱骏声更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更明确地解释道：“孟子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迹即记之误。”

这里说的是指孟子在其著作中曾说，上古时期王者用击打木铎采集诗歌的行为渐渐沉寂之后，诗歌的搜集活动停止了，于是《春秋》这样的大作才得以问世。许慎和朱骏声的解释只是针对孟子的偏古语言而做的解释，令今人更清楚地理解了孟子的话意。

其二，是《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的话说：“故夏书曰，道人以木铎询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师旷是春秋时期的著名乐师，这段话本是记载师旷与晋悼公之间的一段对话，意在规劝晋悼公不要向卫国国君一样拒绝纳谏。他引用了周代王室采诗纳谏的典故，说“《夏书》里说过，‘宣令官摇着木舌铃沿路宣告，官员们进行规劝，工匠呈献技艺当作劝谏’。正月初春，这时就有了宣令官沿路宣令，这是因为劝谏失去了常规”。这段话也间接地说明周代曾有过周代官府采集民间诗歌的作为。

汉代学者承袭了这些说法，明确提出，周代有“采诗”制度，而且说法颇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孔丛子·巡狩篇》记载：“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

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并且还认为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是出于“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目的。

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中说：“男女有所怨恨，

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刘歆《与杨雄书》记载：“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道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欲得其最目。”

以上诸说虽有一定根据，但在采诗的时间、方式、主体等方面却不尽相同，说明汉代诸学者都是根据汉代乐府民歌的采集制度所做的推测，某些细节甚至可能还出自想象，未必就是《诗经》的采集原貌。因此，清代崔述曾据此对采诗之说提出过怀疑。他认为，《诗经》成书历时五百余年，为何“前三百年所采殊少”？春秋千八百国，为什么只有十五国“有风可采，其余皆无之”？（崔述《读风偶识》）

崔述的怀疑有一定的根据，然而，《诗经》中的诗歌分量之大、规模与地域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在古代，如不是由官府出面来主持采诗，单靠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力量，去完成这一间隔时间长、流传范围广的采诗任务，是不大可能的。也许不一定每一代国君，每一个地区都有采诗之职，但作为王朝的乐师，为了配乐的需要，注意搜集一些地方的民间诗歌，或者士大夫的作品，用以配乐演唱，这个可能是存在的。至于采诗的目的，如班固说是为了所谓“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则可能是增饰之词，并非当时的真正动机，而仅是为了合乐、娱乐、欣赏，甚至典礼的需要而已。

（二）献诗说

这也是汉代学者的观点，认为周代有让公卿列士献诗的制度，主要是为了补察时政，揭露时弊，倾诉个人的怨恨或愤懑。关于周



代的献诗陈志之说，先秦古籍里就有许多记载。

《国语·周书》载召公谏厉王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颂，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意思是说天子处理政事时，让三公九卿以至各级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少师诵读箴言，盲人们吟咏诗篇和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百工纷纷进谏，平民则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谏之力，君王的同宗都能弥补、监察国王的过失，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加以谆谆教诲，德高望重的师傅再进一步劝诫他，然后，由天子斟酌取舍，付诸实施。这样，国家的政事才能得以实行而不违背常理。

《国语·晋书六》载范文子语：“吾闻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颂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辩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古时候的君王，在建立了德政之后，又能听取百姓的意见，于是叫瞎眼乐师在朝廷上诵读前代的箴言，在位的百官献诗讽谏，使自己不受蒙蔽，在市场上采听商旅的传言，在歌谣中辨别吉凶，在朝廷上考察百官职事，在道路上询问毁誉，有邪曲不正的地方就纠正过来，这一切就是警惕戒备的全部方法了。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的话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意即从天子以下，人们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观察和补救他们行事的得失。太史记录国君的言行，乐师写作讽谏的歌诗，乐工吟诵规谏的文辞，大夫规劝开导。士向大夫传

话，平民公开议政，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

以上文献，均有力地论证了公卿献诗制度的客观存在。

另外，从《诗经》的作品本身来看，歌颂诗和政治讽谏诗的存在，说明献诗的制度也可能是存在的，因为这类诗歌在《诗经》中被列为“正诗”，表达公卿士大夫对天子的讽谏或赞颂，表达对王政的评价，收在“二雅”之内，例如：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我的大王，正因为衷心地爱戴您，所以我才如此大声地劝谏您）（《大雅·民劳》）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家父做了这首诗，用来追究大王的昏聩。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家父”，乃是一位姓家名父的周幽王时期贵族，并非平常我们所理解的“父亲”）（《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我，一位惨遭宫刑的大臣孟子，写下了这首诗歌流传后世，希望世间的君子大人们，恭敬地聆听这首诗篇吧。这里的“孟子”，也不是那位继承了孔子学说的亚圣孟子，也是周幽王时期的一个文人，名巷伯，表字孟子，是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遭受宫刑的文人，也是后世宦官的鼻祖。汉书记载司马迁冤如巷伯，指的就是这件事）（《小雅·巷伯》）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吉甫写下了这首诗歌，篇幅绵长，情深义重，曲调典雅，音节优美，就用它赠送给申伯留作纪念吧）（《大雅·崧高》）

《诗经》中的这些诗篇足以证明，周代确实存在公卿献诗制度，所献之诗可以是自己创作的诗歌，也可以是采集来的他人之作。

此外，除了“二雅”及“国风”之中的许多民歌之外，《诗经》中还有许多用于祭祀及宴飨之作，这应该是王朝司乐大师等乐官或巫



史奉命创作的乐歌,大多收集在“三颂”之中。

(三)删诗说

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论点的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其《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意思是说古时候有诗歌约三千多篇,到了孔子的时候,剔除了其许多重复的部分,取用可以施予礼仪的部分,上采自殷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之时的诗歌中叙述了殷周时期的繁盛诗篇,一直到幽王厉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期。305 篇诗歌,孔子都曾经歌咏过,以求得符合《韶》、《武》、《雅》、《颂》这样的美妙之音。

东汉王充在其《论衡·正说》中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也说古时有三千多篇诗歌,到了孔子的时候删繁就简,留存 305 篇。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也记载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班固不仅说明了《诗经》中诗歌的来源乃是历代采诗之官采集,而且还继承了司马迁“孔子删诗”之说,并进一步说明了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的删汰原则。

删诗之说在《诗经》学史上曾经有过十分重大的影响,且历时逾千年之久,其主要论据,一是《史记》、《汉书》去周末远,且在史学上颇具权威,不容置疑;二是殷周时期诸侯国数量庞大,诗歌总量绝对是个惊人数字,绝非仅十五国才有民歌供采诗官采集,期间一

定经过了大幅度的删裁；三是《论语·子罕》也曾记载孔子曾亲口说过：“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圣人之言，自然不容怀疑。

但孔子删诗之说也存在诸多疑点，孔颖达在其《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中首先质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后来的宋代学者如朱熹、叶适等经考证得出结论，早在孔子之前，《诗经》已经定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各国风诗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当时被称为周乐的《诗经》已基本定型，其时孔子才刚刚八岁，显然不可能删定《诗经》。

《论语》以及《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其自卫返鲁之后，但据《论语》所载，孔子本人在此之前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诗三百”这样的说法。

各诸侯国君臣宴飨或使者相会常常会“赋诗言志”，所赋之诗绝大多数都出于今本《诗经》。“赋诗言志”的风气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广为流行，若无通行的定本，诗歌何以能够成为表情达意的恒言共语，宾主双方又如何能够信手拈来、纯熟运用？

然而，尽管孔子删诗之说颇存疑问，但也不能全面否定。文献记载孔子对《诗经》推崇备至，“皆弦歌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孔子对《诗经》肯定是做过一番整理删节的，只是并非如《史记》所言曾将“古者诗三千余篇”动巨大手术，直至仅存“凡三百五篇”而已。那么，历史上又是谁，将浩繁的数千首诗歌删定为现存之三百零五篇的呢？